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书系

马 超◎主 编 郭文元◎副主编

重估与找寻

—— 现当代文学批评实践

丁念保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书系

马 超◎主 编 郭文元◎副主编

重估与找寻

—— 现当代文学批评实践

丁念保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估与找寻：现当代文学批评实践 / 丁念保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8

ISBN 978 - 7 - 5161 - 4727 - 6

I. ①重… II. ①丁…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批评②中国文学—
当代文学—文学批评 IV. ①I206.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00835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郭 鹏

责任编辑 郭 鹏

责任校对 王丹卉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

插 页 2

字 数 242 千字

定 价 4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序

天水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是本校自 1959 年建校以来最早重点建设的专业之一，半个世纪以来先后有张鸿勋、雒江生等学者为学科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新时期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本专业得到全面发展，逐渐形成了年富力强、学术研究活跃的研究梯队。2008 年汉语言文学专业被教育部批准为特色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被列为第一轮校级重点学科。

五年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中青年学者，秉承老一辈学人的严谨学风，关注前沿，锐意创新，发表 CSSCI 期刊文章 60 多篇，获立国家、省部级社科基金项目 10 多项，逐渐形成相对集中、相对稳定的研究方向：“底层文化与新世纪文学”、“延安文艺与当代文学”、“甘肃文学与地域文化”等。其问题视域分别为：立足西部社会在城市化进程中凸显的民众底层处境和乡土情怀，关注文学中的民生民本、现代伦理和文学审美；利用靠近延安，地处陕、甘、青革命根据地，尤其是陇东革命老区的地缘优势，着力于革命文艺中主流意识形态的发生与流变研究；借重甘肃多元民族文化优势，关注甘肃地域文化符号特征及甘肃作家群的文化身份。在对“底层文学”、“延安文艺”、“甘肃文学”的关注中，我们力图建构它们在中国当代文学语境中的“边缘性”、“地域性”以及“冲击性”。现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书系》学术著作八部，集中呈现了天水师范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近年来的研究成果。

“底层文学”是新世纪文学中最活跃的文学思潮，李志孝教授的《现场·历史·批评——新世纪文学与新文学传统》、王元忠教授、王建斌副教授的《从现代到当代——新文学的历史场域和命名》和张继

红副教授的《启蒙、革命与后革命转移——20世纪资源与新世纪“底层文学”》，梳理20世纪不同时期文学中的底层话语谱系，以此为基来论析新世纪“底层文学”在新语境下对现代性经验的书写和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建立20世纪中国文学与新世纪文学内在的精神联系。与20世纪中国文学资源的重估与激活相关，延安文艺规范了新中国前30年文艺的基本价值和艺术走向，也极大影响了当代文学后30年的发展和变迁，探源延安文艺的核心价值观、艺术观，就是发掘、建构中国当代文学中国化、民族化、现代化的过程。郭文元副教授的《乡村/革命与现代想象——40年代解放区小说研究》，在当前多元并存的文化背景中，探寻现当代文学资源中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价值体系。

文学价值的建构和评估与文化板块间的地缘特征血脉相通。甘肃地处古丝绸之路的黄金路段，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历史上东西文化在这里交汇，当今农耕文明、游牧文明与工业文明在这里并存。甘肃当代作家的创作，以独异的地域文化板块为“精神原乡”，逐渐形成了河西大漠——丝路文化、兰州黄河——城市文化、陇东农耕——红色文化、陇南始祖——民俗文化、甘南游牧——民族文化等文化形态的符号特征，并形成了相互独立又相互映照的作家群体。薛世昌教授的《话语·语境·文本——中国现代诗学探微》和丁念保副教授的《重估与找寻——现当代文学批评实践》中，特别发掘了甘肃作家群的这种文化身份。

另外，安涛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成果《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和马超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女性的天空——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也正在准备出版中。这两部著作的出版，将夯实我校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史学基础，延展两个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精神空间，将天水师范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学术高地。

本书系是天水师范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一次集体亮相，无论丑俊，都希望得到各位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

感谢天水师范学院校领导对本书系出版工作的关心，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同意出版本书系。特别感谢本书系的责任编辑郭鹏先生，他为本

书系的出版付出了巨大辛劳，剔除了本书系原稿的诸多粗陋之处，才让本书系得以顺利出版。

马超

2014年4月10日

目 录

第一辑 重审与厘定

爱情题材小说的主体性走向

——以新时期初期十年小说为对象 (3)

对莫言的彻底颠覆

——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合论 (12)

浮士德式爱情精神的高扬、忏悔及反叛

——新时期小说中爱情叙事的审美嬗变 (19)

对“人”的渐近把握

——新时期文学述论 (31)

寻根的“物质诗”和“革命历史诗”

——对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一种诗歌创作现象的评说 (43)

论张承志文学精神世界的体系性构成 (48)

《棋王》艺术手法论要 (61)

对“酒神式精神”的极力召唤

——论影片《红高粱》的文化主题 (67)

悲情而又昂扬的人生表达

——看电视连续剧《民工》 (72)

余秋雨散文的文本特征及艺术偏失 (78)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鲁迅散文《过客》和《死后》的精神关联 (88)

第二辑 尺度的找寻

文艺作品批评尺度的四重“圈级”	(97)
小说人物的命名问题	(105)
论文学作品中的镜子意象	(113)
文艺批评要面向大众	
——市场经济条件下批评的一大选择	(122)
真正捏到了文学的疼处	
——读谢有顺文学评论集《话语的德性》	(127)
“伟大的捕风”	
——评李静《捕风记：九评中国作家》	(133)
为意识形态风暴所掩盖的批评语式的对立	
——对 20 世纪 50 年代《红楼梦》研究和胡风文艺思想批判的文论学反思	(144)
“西部文学”之旗，不扛也罢	(159)
诗美特质的散点观察	(163)
韵律和节奏的和谐之美	
——现代诗不应放弃的潜在性追求	(172)
爱情因无谓错失而感人	
——爱情小说模式化叙事一种	(178)
长篇小说作家应牢记“写作困难”	(183)
黑暗中的芳香与河流里的浮沫	
——关于电影与电视区别问题的美学思考	(186)

第三辑 邇选与阐释

天水青年小说作者创作评论三题	(193)
赤足者的痛苦行吟	(202)
灵魂深处的沉醉与精神领地的高蹈	
——王若冰诗歌的精神观察	(207)

村庄精神的构建和个人表达	
——评薛林荣《一个村庄的三种时间》	(210)
诗意家园的苦意构筑和痴情守望	
——评北斗长篇小说《望天鸟》	(213)
回到源头的吟诵和歌唱	
——评白麟诗集《慢下来》	(216)
她让时间的流逝变得甜美	
——评汪彤散文集《心若琴弦》	(219)
健笔写奇幻，雄腔唱大风	
——评薛林荣长篇小说《疏勒》	(222)
以情写情	
——评苟昌盛诗集《温情至爱》	(227)
后记	(230)

第一辑
重审与厘定

爱情题材小说的主体性走向

——以新时期初期十年小说为对象

大凡对中国当代文学有较深涉猎的人，都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在作为小说表现对象的题材领域中，大多数题材都具有自己的主体性，即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自由、自觉、全面的本质。农村题材是这样，工业题材是这样，军事题材也是这样。然而爱情题材却总是磕磕绊绊，一直走着一条窄狭而又颠簸的道路（当然，爱情与农村、工业这些概念在逻辑上不能同列）。这一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爱情很少被视作独立的表现对象，视作一部作品中的唯一内容而被作家进行抒写，而总是被稀释或夹杂于其他题材之中，甚至常常成为其他题材的装饰和点缀；二是爱情在文学作品中的抒写和表现，通常是被简化了的，不深刻的，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被歪曲了的。

那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显而易见的一个方面，是极“左”文艺思潮对当代文学的影响。极“左”文艺思潮，总是用抽象的阶级性代替活生生的人性，把爱情这种作为人的最起码的欲求也是最高级的欲求，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支配人生，被罗曼·罗兰视作生命三大支柱之一的生命现象，视作与人的所谓阶级性、革命性有违碍的东西。所以，在历次反“人道主义”和反“人性论”的理论斗争中，表现爱情的小说总是首当其冲地遭遇到厄运。当然，极“左”文艺思潮对爱情的冷眼，绝非一时好恶，其更深远的源头，可追踪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弱点上。

新时期文学之始，爱情题材小说就战战兢兢、试试探探地从黑暗阴森的牢笼中摸出，但实际上它没有也不可能迈出更大的步伐或走得更远，而只能回归到20世纪50年代那个水平。这一时期的小说，敢于直面爱情这

一“人”的问题了，敢于提倡人对爱情的权利和自由了，但这些描写表现，实际上并未指向爱情主体即爱情生活和心理意识本身，而是指向了作家关于爱情或爱情之外其他事物的观念上。中国传统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学观念之一“文以载道”，在这类小说中得到了再充分不过的印证，这类小说的创作理念实际上成了“描写爱情以载道”。为了论述的方便起见，笔者把这类小说对爱情的抒写，称作“爱情生活的工具性表现”。在这类小说中，爱情并没有得到全方位的艺术表现，作家关于人物的爱情叙事，与实际生活的真相相去甚远。

就拿刘心武《爱情的位置》来说吧。这篇被视作新时期表现爱情的发轫之作的小说，也许称其为爱情的宣言书更为合适些。它里面充满着冗繁的说教和热切的呼喊，但其爱情形象本身却是干瘪的。相比之下，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就丰润多了，但作者也只是立起了男女主人公灵魂相摄历史的大骨架，未及陶铸出丰满的血肉，便草草收了场。显然，作者是为自己早已力求宣示的理念所陶醉，没来得及在作品的血肉形象间盘桓，便一跃奔向了她的目的。这样，读者的胃口被吊起来了，正在等待伯牙弹出高山流水之音，弦却断了。可以说，这篇小说仍然是一篇爱情宣言，它宣告：爱情是超越社会伦理功利的一种生命现象，它有着只属于自己的运行逻辑和轨道，有着至上的精神和审美价值。作品的内容也只是论据式地证明了这一点，至于男女主人公这场精神恋爱的丰富内涵，作品却远未作出揭示。读这样的小说，读者所受到的哲理启迪要远远胜过感染和陶醉——作家在后来所写的一篇创作谈中坦言，该小说是她读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后所作的文学形式的笔记。

在上述两篇小说中，作者把关于爱情的哲学思考和社会吁求放在了第一位，而爱情形象本身却只是为达此目的而虚构的一个立点。在新时期之初，这种以爱情作立点或视角，而把主旨急切地指向社会问题的小说，占了爱情题材小说的多数。例如：古华《爬满青藤的木屋》立足于盘青青和王木通的婚姻以及他俩幸福的爱情，主题却指向了对精神文明的呼唤；陈建功《飘逝的花头巾》立足于沈萍与秦江的恋爱与背离，主题却在于惊呼社会浊流对青年一代的腐蚀；张抗抗《北极光》立足于单纯向上的青年姑娘苓苓与庸俗自私的傅云祥、老辣冷酷的费源、乐观淳朴的曾储三人之间的情爱纠葛，主题却在于探索动乱初期受过“内伤”的青年人的

人生道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这一类型的小说更有勃兴之势，所谓“中学生爱情小说热”，便是一个再也典型不过的例子。以《挑战》、《无题》、《今夜月儿明》、《女高中生》、《中学生启示录》、《别了，十八岁》等为代表的一批青少年小说，虽然各具特色，但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中学生恋爱的合理性，并以此为基点反思了广大社会对中学生恋爱的不平等对待问题，这些小说，属于社会问题小说的特征就更加明显。

除如上所论借爱情描写提出社会问题的这类小说以外，另外一类爱情题材小说，并不见得提出了多么尖锐深刻，亟需当前社会迫切注意和解决的社会问题，而在于以爱情为视点，折射现实社会生活面貌。在当代社会进入了较为平稳的纵深发展阶段以后，文学逐渐脱离原来的政治反思的轨道向多元化发展，那些宣言式的社会问题小说也就开始慢慢被文学性更浓的社会生活小说所代替，与之相应，提出问题型的爱情抒写过渡到了折射生活型的爱情抒写。1982年前后，路遥《人生》、贾平凹《小月前本》、郑彦英《太阳》等小说，可视作这类抒写的代表。这些小说普遍以潜心探讨当代人随着社会变革而出现的伦理道德建构和爱情心理的复杂变化为己任，并以此为基点，折射该时期的社会生活。由于眼下的社会现实陌生多变而又难以把握，更由于当代文学“伤痕（过去时）—反思（过去时）—开拓（现在时）”这样一种历史走向使然，不少折射生活型的爱情抒写，都把焦点瞄准了“远当代”——即从新中国成立初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这段时间。这些小说，普遍以爱情为聚焦点，反映了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极“左”路线给社会人心造成的深刻伤痕，并对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作出了深切的反思。这类以表现生活真相为旨归的爱情抒写，无论在伤痕文学思潮还是在反思文学思潮中，都起到了先锋和主力军作用：陈国凯《代价》、《我该怎么办？》，黎汝青《冬蕾》、《一个女人的忏悔》，张昆华《爱情的泉水》，郑义《枫》等伤痕文学作品是这样；鲁彦周《天云山传奇》，从维熙《雪落黄河静无声》，张贤亮《肖尔布拉克》、《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反思文学作品也是这样。

在以上“爱情生活的工具性表现”的两类小说中，想用简单的方法判定孰优孰劣是很不明智的——何况两者之间的界限并非那么截然分明。但是，就个中方面进行比较，还是存在可能：急切地提出社会问题的爱情

抒写，有一个十分致命的弱点，就是往往不能把自身具有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①，也即将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地结合起来。因此，这类抒写往往显得血肉不足、形象干瘪，作为传声筒，这些作品受到读者的好评和喝彩往往是暂时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其文学的水分越来越少，也就越来越没有价值了。

随着文学的社会化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兴起的通俗文学热，打破了文学界的一元化状态，“严肃文学”包打天下的局面，有了明显改观。这股通俗文学热说到底就是通俗小说热，而所谓通俗小说，主要包括武侠小说和爱情小说。通俗爱情小说不屑于使爱情沦为空幻，变成什么社会生活的反映，不屑于绑在政治的裤腰带上，使自己成为单纯的或不单纯的传声筒。这一特征的出现，明显地与文学的消费化现象有关，也许算不上文学自身的一种积极选择，然而在客观上，比之于工具型的爱情题材小说，通俗爱情小说更具有自己自由、全面、自觉的本质。从对题材的回归即主体性的实现这一角度看，这一层次小说对爱情的抒写无疑比前一层次向前迈进了一步。然而这一超越绝非那样乐观，它一开始就遇到一对矛盾，即小说客观上呈现出来的超越趋势和传统文学理论批评所标举的审美规范之间的矛盾。这对矛盾交锋的结果是，后者占有绝对上风。这样，从工具位置上最先脱离开来的这一支爱情小说队伍，便被加上了一个不算好听的形容词：“俗”。不过，这支爱情小说队伍本身也并不是多么争气：从工具地位脱离开来以后，并没有考虑怎样去跨出新的更有价值的一步，反去迎合中下层读者的口味，结果免不了陷入雷同且庸俗的泥淖。

鲁迅先生说得好：“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与大众有益的。”^② 这类小说虽说实现了题材对象的主体复归，它以全面向全方位反映爱情生活为己任，然而这种反映还只是远远停留在爱情结构表层——爱情是一个心理（精神）一实践结

^① [德]恩格斯：《致斐·拉萨尔》（1859年5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7页。

^② 鲁迅：《文艺的大众化》，《集外集拾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338页。

构，通俗爱情小说只是反映了爱情结构的实践表层，至于更深的一个层次即心理（精神）层面，却远远未能作出揭示，偶有所触及，往往也只是浅尝辄止，远远谈不上深刻。由于这类小说把爱情只当作实践现象看待，故爱情小说被浮浅地理解为讲爱情故事的小说。于是，这样的小说便出现了：“三角形”的，“四边形”的，“五星形”的，甚至于“雪花形”的。由于通俗爱情小说只把爱情当作实践现象对待，而不是从发生机制上认识，不把它更深地看成“内宇宙”的精神产物而只看成“外宇宙”的实践产物，不把它更大程度上看成两个“内宇宙”之间一场无声的精神碰撞、格斗、改变和再生，故通俗爱情小说对爱情的表现还只停留在表层——尽管它以基本上抛弃小说除爱情而外其他方面的认识、教育等价值为代价。因此，从爱情题材主体性之外的其他角度讲，它都更像是爱情抒写的一次倒退。至于那些“爱情+武侠”式的小说，则是把爱情从社会工具拉向武侠工具，因而便成了文学意义上最低劣的一类。然而，通俗爱情小说毕竟开拓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表现领域，这是必须大加肯定的。从题材主体性角度讲，通俗爱情小说是对新时期小说中爱情抒写的第一个发展层次的否定，尽管这一否定失之偏颇，付出的代价又太多，但没有这一层次的否定，可能也就不会有第三层次的纵深。

中国台湾作家琼瑶的大多数小说是通俗爱情小说中的精品。为了说明中国当代文学中出现的这一层面的小说，笔者取之作为分析客体。琼瑶小说对爱情天地自有一番表达，她不执意于从爱情的纠葛和悲剧中去生发道德、人生的哲理意蕴，可以说，她执著的就是爱情本身。台湾一位评论家在谈到琼瑶的代表作时说，《窗外》没有“窗外”。诚是这样，在琼瑶几乎所有的小说中，很难看出“窗外”时代生活的影子，也就是说，爱情内容在其小说中占有绝对的至上的唯一的即主体性的位置。琼瑶小说流行到大陆来，曾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极度恐慌，事实上，琼瑶小说中的爱情既不粗俗，更不下流，绝不会引起读者的恶心和肉麻，相反，她认认真真地写少女怀春和青春意识，写爱的朦胧情的纯真，爱的缠绵情的饥渴，写纯洁神圣和痛苦绝望，从而在实践层面上还原了爱情的本来面目。而这一点，正是第一发展层次上的爱情抒写所不具备的。鉴于以琼瑶为最优秀代表的通俗爱情小说已实现了爱情题材的主体性回归，并全方位地描写展示了爱情的实践层面，故通俗爱情小说可名之为“表层结构爱情主

体小说”。这类小说中的极少数精品，一定程度上触及了爱情结构的心理（精神）层次，然其揭示还远远不足。

“人的精神世界作为主体，是一个独立的，无比丰富的神秘世界，它是另一个自然，另一个宇宙。我们可称之为内自然、内宇宙，或者称为第二自然，第二宇宙。因此，可以说，历史就是两个宇宙互相结合、互相作用、互相补充的交叉运动过程。精神主体的内宇宙运动，与外宇宙一样，也有自己的导向，自己的形式，自己的矢量（不仅是标量），自己的历史。历史的描述如果只记得外宇宙的运动，而忘记内宇宙的运动，这种描绘将是片面的。”^① “爱情生活的工具性表现”还远远没有实现题材对象的主体性，而通俗爱情小说虽实现了这一目的，但其所描绘的是爱情的实践层面即爱情的“外宇宙”运动，因而它是片面的、不深刻的。刘再复在探讨“文学是人学”这一著名命题时指出：“文学是人学”这一概念，不应当只理解为文学是表现人的行为的，它应该深化。首先，这一命题在文学领域恢复了人的实践主体的地位，我们应该恢复其使人具有精神主体的一面。其次，不仅要承认文学是精神主体学，而且要承认文学是深层的精神主体学。再次，文学不仅是某种个体的精神主体学，而且是以不同个性为基础的人类精神主体学。^② 与之相应，我们得出类似结论：描写爱情的文学，不应当只理解为是表现人们的爱情行为的。新时期初期的部分作品如通俗爱情小说，已恢复了爱情作为实践主体的地位，我们应该恢复其作为精神主体的一面；我们不仅要承认描写爱情的文学是精神主体学，而且要承认它是深层的精神主体学，描写爱情的文学不仅是某种个体的精神主体学，而且是以不同个性为基础的人类精神主体学。若此，真正意义上的爱情文学的主体性就宣告实现了，那时候，勃兰兑斯关于文学最终意义上讲是心理学的断言，起码可以在描写爱情的文学作品中得到证验。

幸而，我们很快盼望到了王安忆的“三恋”即《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的出现。王安忆是手拿一把板斧的人，类似于海明威大刀阔斧砍去语言的枝枝蔓蔓，只留下一个电报式的主干，王安忆削

^① 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

^② 同上。